

爷爷是位革命老军人

◎陆霏

近日,小姑在家清理杂物时竟然翻出一张爷爷的《退休军人证明书》,是1949年12月27日由华东军区签发给苏北行署的,老旧泛黄的纸上,陈毅司令员等首长的印章暗红而清晰。过去大家都以为爷爷是位回乡复员军人,这才知道他是一名标准的退休军人。

爷爷幼时家境贫寒,家中兄弟姐妹7人,作为长子,被生活所逼,他14岁到地主家做童工,上街用绳子帮着曾爷爷一起拉黄包车,吃尽了千辛万苦。18岁时,爷爷参加了新四军。1948年12月在淮海战役中,时任团部通信班长的爷爷不幸被压在倒塌的工事下面三天三夜,所幸被打扫战场的战友发现才得以脱险,但多处骨头被压断,双耳也被炮弹声震聋,至1949年12月回乡时,右手臂仍然用绷带吊在胸前,双耳也无听觉。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他,华东军服厂先后3次来人催他去上海工作,地方上也曾打算安排他到区公所任护税员,土改时还准备给他分三间大瓦房和一张大床,但都被爷爷婉言谢绝了,他说:“自己有手有脚,应该自力更生,不能因为有一点功劳就坐享其成。”

多少年里,爷爷和奶奶起早贪黑,辛勤劳作。20世纪60年代初,南通水利部门组织海安等地区民工到仪征青山开采砂石矿,爷爷积极报名参加,在长达4年繁重而又危险的开采中,爷爷历经艰辛,出色地完成了任务,受到上级领导的嘉奖。爷爷不仅养育了自家3个儿女,而且还资助弟妹4人完成了初、高中学业。

爷爷回乡10多年后,在各级民政部门的多次催促和家人、邻居的劝说下,才到县人民医院参加了体检,被民政部门评定为二等乙级革命残废军人,每年享受136元的残废金。事后,有人帮他算了一下,由于没有及时评残,不论是经济上还是其他待遇上都损失巨大。然而,每当有人提起这些“假如”的时候,爷爷总是云淡风轻地说:“和我一起参加新四军的有上百人,活着回来的没几个,想想那些牺牲的战友,国家给了我这么多的钱,知足了。”

长年行军打仗中,爷爷患上了多种慢性病,一到冬天,气喘咳嗽,身上疼痛难忍,活动不自如。明明医药费用可以全部报销,但他总是推说这是老毛病,冬天一过就好了,不能让国家花冤枉钱。

在父母的一再坚持下,爷爷勉强搬到城里住,可他一刻也闲不住,父亲怕他憋出毛病来,就托人帮他找了份门卫兼清洁工的临时工作。爷爷每日起早带晚,忙个不停,两个人的工作,他一个人全包了,认真负责、任劳任怨,大家十分满意。爷爷一干就是15年,直到76岁那年在工作时骨折,才离开了工作岗位。

80岁那年,爷爷因旧伤复发合并肺部感染住进了医院。他从未因病痛呻吟过一声,临走前还嘱咐父亲姐弟仨说:“要争气,好好工作,照顾好你们妈妈,我走后一切从简……”

爷爷虽然离开我们有16个年头了,但他的精神仍然激励着我们。



留春住

◎子穆

别样的温暖

◎严世进

人生,总有一些让人难以忘怀的往事,让你回想起来有着别样的温暖!

那年腊月,天寒地冻。我从机关被抽调到高明公社检查救济物资分配落实情况。在复兴庄村头的大场边,看到一个大爷站在一间低矮的草房前,我感觉到情况有异,主动招呼大爷,大爷把我们引进草房,看了一眼,我们就愣住了,屋里除了一个小土灶和一个里面铺了一层稻草、放着一卷草帘子的水泥管外几乎没有其他东西。我的嗓子眼像堵了什么。大爷说,他姓孙,今年七十二,无儿无女,因为当年上河工受了伤,不能做重活,加上现在年纪大了,生产队照顾他,让他看大场,没想到年底算下来还要倒找生产队的钱。养了几只鸡,还被黄猫儿拖走了两只。向大队书记了解情况,对方说:“前年分给他一套棉衣棉裤,已经破旧了。你们放心,我们来想办法。”今年计划少了,我理解他们,没说什么,只能默默记在心里。

回到家,这件事总压在心里,我辗转反侧,怎么也睡不着。第二天一大早,我从衣柜里找来一套我平时穿的棉衣和棉裤,顶着呼啸的西北风,骑着自行车一路奔向高明复兴庄。路过高明食品站时,我找在这儿当食品站站长的高中同学买了一副全麻(全套猪内脏,那时是要计划的)。那天,孙大爷依然蜷着身子,两手交叉插在衣袖里,坐在草房门口晒太阳。我放下东西,告诉他,这是公社安排的一套棉衣和一点年货。大爷紧紧拉住我的手,含着泪说:“还是共产党好啊!”

第二年正月初四,我到舅舅家去拜年,又路过大爷草房门口,他热情地招呼我进屋喝酒。屋里新添了一张小方桌,上面用盘子盖着四个擦得净亮的白瓷碗、一个白瓶子和两个红色的酒杯。我还发现稻草堆里多了一床被子,不由得心里一宽,顺手把带来的糖果放在枕头边。“你那天走后,

我天天都要到门口看一看。今天一大早,我就一直站在门口等你来。”大爷一边说,一边打开瓶子,满上酒,我站起身:“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,谢谢你,我舅舅一家人还在等着我呢。”可大爷挡在门口,说什么也不让我走,最后我只好吃了两片猪肝,猪肝已经有些硬了,我知道应该是不舍得吃,已经放了好几天了。我们一来一往,记不清喝了多少杯。“多少年来没有这样开心过!”大爷说。我也是第一次这样喝酒,这酒真香!

我们匆匆告别后,相约明年再见,可没有能够兑现。多年以后遇到当年的村支部书记,他第一句话就说:“严书记,你是个好人啊,当年那个孙大爷在我们面前不知夸你多少次,还经常念叨你什么时候再去。”

前不久,到表兄家,走到当年的那个大路口,现在已经是一条宽阔的水泥路了。我下意识地 toward 大爷草房那边看去,只有一片绿油油的小麦地了,不过我也算了却了一个心愿。

1991年4月,我调至加力乡担任党委副书记。7月的一天,那边遭遇了一场大暴雨。天刚蒙蒙亮,全体乡干部按分工奔赴各村,组织干部群众抗洪排涝。

那天,我一路巡查到加力村,站在大渠边上,远远看到一个农户家,三间低矮的草房像水中的一座孤岛。走近一看,屋内已全部是水,四周的土墙已经浸湿,明显倾斜,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。一个蓬头垢面的男人双腿盘坐在门前的板凳上,后背靠着门框,看着门前浑黄的泥水。东屋一个中年妇女左手抱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,右手摇着一把泛黄的芭蕉扇,嘴里唠叨着:“这该死的老天,真是不想让人活了。”进屋后,我们发现屋顶多处还在往下滴水,我急忙操起一个水桶,舀了一桶又一桶。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,我们终于把屋里的水排完了。我走到门外,把上衣脱下来,挤去雨水和汗水,伸了伸腰,长长舒了一口气。这时,那个男人才开了口:“谢……谢谢你。”他艰难地移动了一下身子,

又说了一句:“实在……不好意思。”示意我坐下来歇歇。

大队宋书记赶来向我们介绍了大队受灾排涝的情况和这家的处境。男的双腿瘫痪,已经完全失去了劳动能力;女的也有一条腿有问题,但是人很好,吃苦耐劳。家里就一个土灶、一张木床和几件小农具,其他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,平时生活来源就靠养几只鸡和一头猪。我对宋书记说:“我们一定要帮助他家首先解决住房的问题,这土墙如果再遇上下大雨就要倒了;建房的材料我来想办法,三天内组织到位,五天内你要负责建好。”

检查和布置完整个排涝救灾工作,我即回乡政府,向党委陈书记和张乡长汇报排涝情况,重点商量了解决这家住房问题的措施。陈书记拿起手摇电话,和砖瓦厂谢厂长做了布置,并交代由我负责落实。按照领导的意见,第二天一大早,我就赶到砖瓦厂,和谢厂长一起对所需材料进行了具体的估算,随后组织两班人马,一组负责木料、椽子和其他所需材料的准备,一组负责砖、瓦等所有材料的运送,第二天下午,所有的建房材料都运送到了现场。宋书记也已经落实好了瓦工、木工师傅,决定第三天正式开工。我特别跟宋书记强调,老百姓的事不能耽搁,时间、质量要确保。

按照约定,我第五天赶到现场,远远就看到三间红砖瓦房已经建好。我和大队宋书记屋前屋后、里里外外查看了一遍,边走边商量着这户人家灾后的生活安排和今后的帮扶。这时,女主人拿了四五个鸡蛋和几个鲜嫩的玉米棒子突然跪在我的面前,连声说:“谢谢,谢谢,我们全家人一辈子都忘不了你呀!”我一时不知所措,慌忙把她扶了起来:“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!”

后来,我听说了孩子上小学的时候,他们把小孩原名“谢小宝”改成了谢进(用了我名字中的一个“进”字)。感动之余,我常常想,我们的老百姓是多么善良、淳朴,他们用这种特别的感恩方式让我生出一种别样的温暖:只要你为群众做上一点点事,他们就会永远记住你!